

流金岁月

明前茶

亲爱的搪瓷

70后和80后的童年,都拥有过搪瓷碗和带把儿的搪瓷水杯吧,那是幼儿园的统一配置。李媛到现在还记得,她在某间怀旧饭吧里,见到搪瓷杯里蒸的鸡蛋羹,和肉沫老豆腐,心里的那个激动——甜萌的杯子把回忆都激活了:“简单的白色搪瓷杯子上喷绘了和平鸽,或者五角星,拙朴得跟儿童画一样。在社会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跌打滚爬后,我们猛然意识到有一个平等的、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多么可贵。”

搪瓷,就这样走回了我们的视野,在新开的杂货店里,或者怀旧菜馆里,搪瓷菜盘、收口的有温柔棱线的搪瓷花瓶,带盖子的搪瓷饭碗,还有各种颜色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去的搪瓷水杯,应有尽有。反正,有了根深蒂固的童年记忆,30岁以上的人会觉得,注入搪瓷杯里的酸梅汤格外激爽酸甜,豆浆也浓得可以凝结出一张薄薄的豆皮!

当年,每个新家庭的诞生,都和搪瓷息息相关。一对搪瓷脸盆,喷绘有牡丹花图案的搪瓷热水瓶,都是送给新婚夫妇的最佳礼物。父辈还会送来自己获得年度先进工作者

的奖品——一对很大的搪瓷杯子,里面装得下一公斤蜂蜜,或猪油。曾经在搪瓷厂工作的老单,清清楚楚记得1985年他结婚时,朋友通过出口途径,帮他买到了一套深红色的搪瓷水杯,个头很小,杯身上印有小天使或深绿色的、缀有松果的圣诞花环。这套水杯他到现在还珍藏着,宝石般的深红色带来美好的祝福和宁静感,是他在别的搪瓷作品上从未见到过的。就在得到杯子的那一天,老单才知道搪瓷的别名叫是“珐琅”。

这是一种涂烧在金属底坯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,一般使用喷枪把釉粉或釉浆涂敷到金属坯胎上。老单当年是喷枪涂敷方面的好手,这是需要眼疾手快、脑子灵透的活计,需要反复揣摩喷枪的气压大小、喷枪口的远近距离,在一瞬间内无限逼近原稿的艺术效果。涂喷也是“不可更改的艺术”,在高速喷枪的扫描下,涂敷一只搪瓷脸盆最短只需70到90秒钟,在这样短的时间里,脸盆上出现的牡丹花,花蕊一样有淡淡的阴影,花叶有国画般水墨淋漓的脉络;若是出现一对鸳鸯,



公鸳鸯金橙色的颈毛上会反射紫金色的光芒,翅上有一对栗黄色扇状羽毛,像帆一样立于后背。母鸳鸯灰褐色的身体上布满白色的圆点,眼眶后面连着一道极细的白色眉纹……就像水中活物一样!

快二十年过去了,因为搪瓷生产中的酸洗污染无法解决,绝大多数搪瓷厂都停产了。好的搪瓷作品,都成了难得的收藏品。老单今天还记得当年,说服大家放弃大红

牡丹配翠绿叶片有多么不易。他自己绘制的藕粉色牡丹配淡淡的水墨叶片,被喷在搪瓷盘上,出口到美国,人家配装一个镜框,当工艺品卖60美元。老单回忆自由创作的那个年月,还记得自己写过的一首小诗:“牡丹在灿烂的盛放中/感知忽来的忧伤/就像绚烂秋阳中/一朵孤云带来的/边界清晰的寂寞。”

他是在预言搪瓷艺术的今天,与未来吗?

艺海泛舟

陆小鹿

绿房子舞会

在一个音乐讲座上见到了严尔纯先生,他是海派作家程乃珊的丈夫。年轻时,我常透过程乃珊的文字来遥望上海。

严先生,穿一件粗花呢西装,系一条米黄色的格纹领带,西装袋口插着手帕,头戴一顶许文强的礼帽,帽沿还插着朵羽毛,一派上海老克勒的绅士风范。

外地人对“老克勒”三个字可能不是很熟悉。老克勒代表一种生活品质。“克勒”是个外来词,是根据英文单词Collar音译过来的,意思是白领。它曾经是上海滩的一个符号,是注重精神质量的一小部分的缩影。在“克勒”前面加上一个“老”字后,更多了层特殊的身份认证,严先生是担得上老克勒这个标签符号的。

严先生出身书香门第,外公家最有名的是绿房子(严先生是绿房子房主颜料大王吴同文的外孙),坐落在上海铜仁路上。因其建筑和围墙大量采用绿色面砖,所以被叫作绿房子,而它的设计者,是在上海建筑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匈牙利建筑家邬达克先生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绿房子里高朋满座,名流荟萃。由于拥有超大面积的豪华圆形舞厅,且是“弹簧地板”,每周两次的绿房子舞会,成为名噪一时的名流沙龙。讲座上,严尔纯先生回忆了从前他外公家舞厅里的盛况。

当时正值大乐队(BigBand)时代,舞厅里客人们常跳起Jitterbug摇摆舞。跳舞的开场曲通常就两首,一首是GlennMiller的《IntheMood》,另一首是

人生写真

耿艳菊

童年如夏

前些天,孩子很郑重地把科学课上的几粒黄豆种子种在了小小的塑料杯里,还没有厨房中量米用的量杯大。我没怎么在意,孩子却非常认真,每天不但耐心温柔地照料,还仔细观察,杯子里有一丁点儿变化,就十分开心,很幸福的样子。

没想到,植物的生命力还真强盛。这样狭小的环境还真萌出了小芽儿,几天就长出了绿莹莹的小叶片。观察它的生长,成了孩子每天最快乐的事。

晚上,孩子和同学微信聊天,话题就是他们各自种植的植物。两个孩子细细地向对方描述自己植物的生长状态,叶片的颜色形状,又是如何照料。

今天早上,孩子醒来,穿上鞋就跑到窗台去看他的黄豆苗。“又长出一片叶子啦。”他大声地宣布。大家都在忙各自的,没人理会他。我正在洗脸,他就跑到我跟前向我炫耀:“你知道吗?这是第五片叶子了。”

听着孩子快乐又骄傲的声音,我不禁感慨万千,这就是热情纯真的童年时光啊!一种普通的植物在一个平常的早晨长出了一片新叶,就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快乐。

记得年少时,我喜欢早上醒来看阳光在窗户外起舞。有风的时候更美,明亮的阳光又变成了大自然的颜料,被风这个大画家在青翠的窗帘上涂涂抹抹,一会儿是河流,一会儿是高山,一会儿是森林……我天马行空地

ArtieShaw的《BegintheBeguine》。舞会中场休息,就到了玩游戏的时候。他们通常会玩两个游戏。一个是Bingo游戏。每位客人手中会发一块A4大小的板,上面写了各种各样的数字。主持人随意报数字,若板上有此数字,就贴上一张小黑纸。最早能将黑纸连成直线或斜线的喊一声“Bingo”,就代表赢了,可以领取到一份奖品。

此外,还有一个游戏叫:抢舞伴。将男女按两两数量分好,再多出一位女士。音乐响起,男女两两配对跳舞。音乐一停,大家都要更换一个舞伴,落单的一位手里就要拿块找舞伴的牌子,等她下一轮找到舞伴,就可以扔掉牌子,牌子换给另一位落单的女士持有,有点类似我们小时候玩过的“抢凳子”的游戏。

在那个年代,懂英文是件时髦的事。严先生说他6岁时就学会了唱英文歌,现场他演唱了一首DeanMartin的《MagiciantheMoonlight》。雄厚的嗓音,地道的发音,老克勒腔调十足。我自诩是一个音乐爱好者,但严先生提到的很多老歌我都不知道。讲座上,严先生提到的那些歌曲,都一一播放了视频,我也将这些曲名一一写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,打算回家好好聆听一番。我们没有机会亲临绿房子舞会,但我们可以在共同的音乐中去想象那些场面,感受一下别处生活,这是对我们平淡现实生活的一种调剂。美妙的别处世界是诗歌,是梦想,点燃我们生活的激情,听着那些遥远的歌曲,我恍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小克勒。

城市屋檐

陈慈林

起名趣谈

儿媳预产期尚在7月中旬,为新生儿起名却早早列入家庭重要议事日程,家庭“联席会议”郑重决议,提前半年将起名重任委托老汉我执行。

起名这事,说简单了无非是在社会活动中区分你我他的代号;说复杂了,那简直就是项繁杂的系统工程。

中国人起名,经常是父(母)姓氏在前,名字在后,汉族一般是一至二字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人们起名往往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,因此建国、国庆、卫东、永红等比比皆是。七八十年代后,起名更多寄托对孩子的美好愿望,如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,名字中常见财、富、元、宝等,女孩则以花、娟、玉、芳居多。也有人根据姓氏谐音起个吉祥如意名字,如“于(鱼)得水”“牛得草”“马家骏”等。港澳台地区流行星象学,孩子起名还得参考其生肖属相、五行构成,如缺水者用淼、缺水者用

森、缺金者用鑫等等。

但中国常用汉字只有三千多,常见姓氏仅数百,人口却已超过14亿,起名时大家遵循的基本又是同一思路,姓名“撞车”自然在所难免。不信你试着在闹市区高呼一声“建国”,说不定会有五六个脑袋同时扭转,七八个嗓音同声应答。据称全国某次人口普查时,仅沈阳市叫“王涛”的就有4000多人。如此一来,本来用来区分你我他的最基本属性,顿时成为一笔糊涂账:《人民日报》公布全国人代会代表名单,同一省市同名同姓的代表竟然有三四个,不得不在括弧中以职务区分之;更有因同名同姓的人犯罪,牵累他人被作为网上逃犯多次被误抓。起一个有别于他人的名字,就成为社会性课题。

九十年代以降,一些人起个性化名字摆脱窘境,新华书店的朋友告诉我,一本极少有人问津的《康熙字典》,一度成为热销的起名“宝

典”,有人从这部收载五六万汉字的字典中寻找平时难得一用、甚至难得一见的冷僻字作名字。重名的概率确实大大降低,但孩子长大后制作身份证和其他证件、从事各种民事活动,甚至购买实名制火车票时,都会因电脑字库中找不到此字而头疼,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难以避免的烦恼。更有甚者,孩子从幼儿园开始、一直到大学,就没有几个老师认识这些字,为了避免尴尬,每逢新生见面,老师先让大家“自我介绍”,然后赶紧在冷僻字后注音成为一道风景线。

于是有人把父母双方姓氏组合成新复姓,有人起三个甚至更多字的名字;前些年某地还有家长给孩子用英文字母“A”作名字,区分的目的虽然达到了,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姓名结构却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公安部为此特别颁布了《姓名登记条例》,作出了起名时“不得损害国家或民族尊严,不得违背民

族风俗,不能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误解,禁止使用外国文字、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;除少数民族外,姓名用字应当在2个汉字以上、6个以下”等相应规定。

我为孩子起名的基本原则是:尽量避免同名,便于他人识别、便于孩子今后工作生活;呼唤响亮,不用冷僻怪字;笔划越少越好。起男孩、女孩名各一备用。为给家人意外惊喜,仿照奥斯卡颁奖惯例,所起名字暂时保密。

那年7月14日中午12时24分,一3300克男丁呱呱降世,老汉所起名字“一丁”写在出生证上,取自一二三四之一,甲乙丙丁之丁。不算姓氏总共才三笔,蒙童也能识别,推测汉字中该不会有笔划更少的名字了吧?

有人当面讥我起的名字文化含量太低,有人则誉为“大道至简”。我关心的则是此名是否已达到降低重名概率的目标?

人在旅途

章铜胜

渡口渡过了什么

读白居易的“汴水流,泗水流,流到瓜洲古渡头”时,不自觉地就想起了某处渡口,不一定是古渡口,而是我曾见过,或是从那儿摆渡过去的渡口。那些渡口和诗有关,和江水、古渡有关,仿佛只需一支长篙一叶渡舟,便可将我渡到瓜洲古渡口,去看吴山之愁,看江边明月,看倚在高楼之上的诗人,或是樊素。

瓜洲是一处古渡口,对于我来说,那样熟悉,又是那样陌生,它是不是和我所见过的长江边的渡口相似呢,又或者它有着自己该有的模样。瓜洲古渡,更严肃地说,是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之上,在我的想象里。我知道,它在运河和长江流经的扬州,汴水汇入泗水,与运河相通,最终从瓜洲古渡边流入长江。在白居易的《长相思·汴水流》里,相思如水,一路缠绵浩荡而来,流到了长江边的古渡口,流向了不可知的远方,渡口又怎能承载,或是渡过如许相思呢。

我见过的渡口要简单多了,没有诗,也没有故事,或者也曾有诗有故事,可我并不知晓。不知晓的东西,对于我们没有多少意义,也无需

再去探究。有时,我觉得简单点倒好些,省得生出如许的顾虑来。

二姨家在长江中间的江心洲上,去二姨家玩,要坐渡船。江心洲离长江的南岸近,北岸远,它与南岸之间的江称为夹江,与北岸之间的江才是大江。夹江窄,水流平缓,到了秋冬季节,江水清平如镜。我家在长江南岸,渡过夹江就到二姨家了。渡口在江岸边的一座小村庄旁,沿着村道爬上江堤,再从江堤上走下去,有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江滩,几块石头铺了一条到江边的路,一条木质的渡船就泊在岸旁,摆渡人坐在船头,或是坐在石块上,等着要过渡的人。

那个渡口,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渡口。渡口对面有一座村庄,二姨的家就在那个村庄的深处。所谓的摆渡,其实只是从一座村庄渡到另一座村庄,从一个熟悉的地方,渡到另一个想要熟悉的地方,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不同,可我们还是想要去了解它。那些年,曾经从那个渡口渡过多少回,已经记不清楚了,只记得坐在渡船上,岸高了,村庄和村庄周围的树在岸上,也是高

高在上的样子,一起坐渡船的人完全没有印象了,总是附近村庄的人,或是从不远的地方来探亲访友的吧。印象最深的是秋天摆渡过江时,总有许多江豚在小船边游动,一会儿沉下去,一会儿浮上来,黑而光滑的背脊,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摸一下。

学校门前是率水河,出学校大门,沿率水河往上游走数百米,河边有一处渡口,渡口用大块麻石砌了台阶,石阶没人河水中,渡船则泊在阶下等客。率水河边的渡口,藏在浓密的树荫之下,藏在沿河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之中,颇有古意,像是一处古渡。渡过率水河,对面是高山,山下有村庄,山上林木丰茂,有泉有溶洞。周末,常约上两三好友,坐了渡船去高山玩。

渡船是木质小船,颜色灰暗,大概是久经风吹日晒的缘故吧。船上有舱,舱上有竹片箬叶编的顶,可以遮阳挡雨。过渡时,我喜欢站在舱外,站在船头。摆渡的人,五十岁上下的年纪,个头不高,人很干练,头上常戴一顶箬帽,倒有些像江上打鱼的渔夫,可能没有人渡河的时候,

他也会撑着船在附近打鱼吧。我们上船,他长篙一点,船便离岸,如箭一般划过平静的河面,向对岸滑去。高山像是张开双臂向我们迎来,我们也是向山奔去,我喜欢这样的感觉,各自欢喜。率水河水不深,水流平缓,清澈透明,舟行河上,如划过一片明净的琉璃般,河中游鱼卵石清晰可辨。率水河是新安江的上游,河里的水能不清吗?

几年前去屯溪,坐车从率水河边经过,看见渡口上下游都修了桥了,不知道那个渡口还在不在,我再也没有勇气下车去找那个渡口了。我希望渡口还在,又怕那个渡口已经没有了。

读《边城》时,对秀秀和她爷爷的那个渡口一直念念不忘,它渡过了什么呢?是边城的人和事,抑或是情与爱,希望与失望,真的说不清楚。克萊尔·麦克福尔的《摆渡人》,其实和渡口没有什么关系,我觉得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渡,和灵魂有关。一苇杭之和一苇渡江,儒与佛,渡过的又是什么呢,它们和渡口有关吗。渡口究竟能渡过什么呢?是人,还是时光,抑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。